

隱蔽的七〇年代

——郭松棻後期作品中的「保釣敘事」

楊婕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中文摘要

本文運用小說、手稿與劃記批註，探究郭松棻後期作品對七〇年代保釣運動的回應。在郭後期的寫作中，對昔時革命導師魯迅的互文，成為郭與其運動經驗協商的重要介面。〈月印〉、〈雪盲〉與郭八、九〇年代重讀魯迅留下的藏書批註與讀書筆記，見證其繞道於魯迅，所間接展開與保釣的對話。

在郭後期的小說中，攸關政治的七〇年代總是隱蔽的。這段消失的時間以十年或十七年為度，以其斷裂與匱缺，洩露小說家的精神癥候。本文認為，郭對戰後初期的眺望，實以左翼為媒介，疊合了對保釣的借代視野，在二二八事件撐開的顯性歷史架構下，嵌入七〇年代的隱性歷史架構。《驚婚》對亞樹的運動經驗之「輕描淡寫」，便極具象徵性地揭示這一點——那是橫渡戰後初期到七〇年代，從戒嚴台灣到冷戰美國，一道屬於左翼的風景線。

而郭生前未曾出版的保釣小說〈冰蠶〉，則以美學技藝的失落，揭示其在思想上清理保釣的「未完成」狀態。對這篇手稿的塵封，因之透露郭嘗試「告別保釣」的轉折。七〇年代從此隱寄在小說中。也正是這道傷口鑿出的景深，使更後

來的郭對歷史的省思有所突破，發展出曖昧迂迴、充滿詩意的敘事聲腔，成就了文學史上的郭松棻。

關鍵詞：保釣文學、保釣運動、魯迅、冰蠶、雪盲

The Hidden Seventies: The “Baodiao Movement Narrative” in Kuo Songfen’s Late Works

Yang, Chieh

Doctoral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essay uses fiction, manuscripts and annotations to explore the “Baodiao Movement Narrative” in Kuo Songfen’s late works. In Kuo’s late writings, the intertextual reference of writings of Lu Xun, a Spiritual Teacher with Both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xemplary Meanings, becomes an important interface for Kuo to negotiate with his own movement experience. “Moon Seal” and “Snowblind”, as well as Kuo’s annotations and reading notes on his re-reading of Lu Xun in the 1980s and 1990s, testify to his detour from Lu Xun and indirect dialogue with the Baodiao movement.

In Kuo’s late novels, the politically relevant 1970s are always hidden. This period of disappearance is measured in terms of ten or seventeen years, revealing the novelist’s trauma symptom through its fractures and shortages. This essay argues that Kuo’s concern of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mediated by the left wing, embeds the

implicit historical structure of the 1970s under the explicit historical framework of the February 28th Incident.

The loss of aesthetic technique in Kuo's unpublished novel "Ice Silkworm" reveals the unfinished state of his ideological purge of the Baodiao movement. This manuscript was sealed, indicating Kuo's attempt to "Farewell to Baodiao movement". The 1970s have been hidden from view in his fiction ever since. Then, Kuo made a breakthrough in his introspection of history and developed an ambiguous and poetic narrative voice.

Key words: Baodiao Literature, Baodiao movement, Lu Xun, Ice Silkworm, Snowblind

隱蔽的七〇年代——郭松棻後期 作品中的「保釣敘事」*

一、前言

現今對郭松棻的討論中，其早年保釣經歷的能見度並不高，縱有少數研究者涉及保釣運動對其後期寫作的影響，也多半聚焦於七〇年代的哲學論述，至多及於歷史創傷如何形構其小說中一種整體精神氣質的解釋¹。「不寫保釣」，堪稱論

* 感謝審查人的寶貴意見。台大圖書館特藏組蔡碧芳小姐對本文的文獻蒐集多所協助，在此謹致謝忱。

¹ 現有研究可概分為現代主義美學與歷史反思兩大主軸。王德威〈冷酷異境裏的火種〉(2002)將郭定調為現代主義骨感美學的能手，指出郭因理想的頓挫，反而得以迴身思考更為廣闊的歷史與生命面相，黃錦樹〈詩，歷史病體與母性——論郭松棻〉(2004)、劉淑貞〈論寫作，以及它的匱缺：論郭松棻的小說〉(2018)深化此一思考路徑，探究郭作品中的精神癥候。不過，當論者以「保釣之後」為起點，將釣運定義為其文學生涯的「斷裂」時期，保釣運動的繁複意義，實難被論述話語所承接。在這樣的視角下，保釣僅被當成一組歷史階段，用以分析作家重返文學場域的節點——而非研究對象。晚近研究則更突顯郭對寫作的形上學思考，如潘怡帆〈重複或差異的「寫作」：論郭松棻的〈寫作〉與〈論寫作〉〉(2017)、楊凱麟〈寫作寫作的寫作——論郭松棻的「時間—文字」〉(2021)等。迄今對郭的左翼意識與保釣經歷投注較深者，有魏偉莉和簡義明。魏偉莉的碩論堪稱研究郭保釣實踐的開山之作，彼時許多文獻尚未面世，魏偉莉憑一己之力還原郭參與釣運的過程，並整理其七〇年代的哲學論述；簡義明的博士論文取得大量第一手資料，無論就史料掌握或對郭生平、思想、氣質與創作動機的理解，皆有深入而全面的觀照，奠定後繼者的研究基礎。不過，魏偉莉、簡義明的研究仍將保釣實踐與文學創作分而視之，未能深究保釣如何演化為郭的創作無意識，形諸迂迴曲折的文學表達；此外，徐秀慧對讀郭松棻、陳映真對魯迅之承繼、陳湧漢著眼於郭的「介入」哲學與後期小說的聯繫性，均切近本文關懷，不過徐秀慧、陳湧漢的研究並非以保釣為出發點。魏偉莉，〈異鄉與夢土——郭松棻思想與文學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簡義明，〈書寫郭松棻：一個沒有位置和定義的寫作者〉(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徐秀慧，〈革命、犧牲與知識份子的社會實踐——郭松棻與魯迅文本的互文性〉，收錄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編，《從近現代到後冷戰：亞洲的政治記憶與歷史敘事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里仁，2011年)，頁217-245；陳湧漢，〈介入與他者的獻／現身——論郭

者對郭的共同印象。然而，保釣運動作為影響郭一生至鉅的經歷，在其後期寫作中，留下的痕跡是否真的如此隱微？

1970 年底爆發的保釣運動中，郭松棻和劉大任同為柏克萊釣運領袖，對海外釣運左翼的發展影響深遠。1972 年郭博士學位中輟，移居紐約就職聯合國，1974 年訪問中國後淡出運動。1983 年以筆名「羅安達」於《文季》發表〈青石的守望〉、〈三個小短篇〉，復出文壇。

在郭後續發表的作品中，那道歷史的目光總圍繞著戰後初期、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展開。但本文從郭的小說中照見的，卻是一種向過去招魂的手勢：關於七〇年代的「歷史的空景」。表面上郭鮮少直涉保釣，但那被殘留的空景中，難道不曾投射出一種迂迴回應歷史經驗的姿態？

七〇年代下旬〈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與〈談卡謬的思想概念〉的系列寫作，其實並非將馬克思主義從思想中清除的過程，而是如郭最後的總結提到，藉此尋找馬克思主義「在今天進一步發展的可能」²。八〇年代回返小說創作後，郭並未拋棄這樣的關懷，只是轉化為相對隱晦的方式，融合於存在主義式的探問中。

郭 1986 年評論木心作品時，曾談到自己和木心的共通點是「離題而做」——「決不定了題就撲上去，反而要離遠」³。這提示我們傳統的「主題—內容」對應模式，實難完整涵納郭的創作思維。文本中那些沉默、啞啞之處，可能蘊含了諸種意在言外——甚至「不寫之寫」的線索。

本文認為，郭後期的小說，有一部分即內蘊了對保釣運動曲折的回應。那些表面與保釣無涉的敘事，細細讀來實暗藏線索——包括保釣作為人物「隱性背景」的文本（《驚婚》），或一名七〇年代赴美留學，受到魯迅啟蒙的青年（〈雪盲〉）。如果掌握到魯迅之於保釣世代的意義，郭對魯迅的再現，實已呈顯間接與保釣對

松棻小說及《哲學卷》中的倫理實踐》（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9 年）。

² 郭松棻，〈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總結）〉，收錄於李渝、簡義明編，《郭松棻文集：哲學卷》（新北：印刻，2015 年），頁 218。

³ 郭松棻、李渝、林冷等，〈木心的散文——專題討論會〉，《中報》，「東西風」，1986 年 6 月 23 日，第 31 版。來自「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ntul_mf0044_088_01-0002。按：典藏號「ntul_mf0044_」為本批手稿總號，為求精簡，以下從略。

話的姿態；將材料擴張到郭於私人藏書留下的劃記批註與手稿，則能更為清晰地照見郭對保釣的反思，其生前未曾發表的保釣小說⁴〈冰蠶〉，提供我們探究郭以文學書寫直面歷史經驗的得與失。

透過考察郭後期的保釣敘事，本文嘗試梳理以下幾組問題：郭於八〇年代重返文學創作後，以什麼樣的方式回應保釣？又如何由此聯繫，乃至催生其他看似「非關保釣」的作品，構成我們今日對「郭松棻」的主要印象？藉由上述討論，本文盼能拓寬對郭松棻的理解，進而指認其於保釣文學譜系的特殊性，深化對於台灣保釣文學和左翼文學成果的認識。

二、重寫魯迅

在七〇年代保釣運動中，面向革命的召喚，郭所信奉的精神導師，是以「吶喊」與「徬徨」之姿，疾聲呼籲知識分子肩起「黑暗的閘門」，改變中國的魯迅。

追溯魯迅的典範形象，早從釣運前夕便已確立。郭於中學初次接觸魯迅的著作即深受吸引。1970年上旬加入留學生社團「大風社」，與劉大任等人一同展開活動。在共讀近代史的過程中，魯迅成為重要的啟引，郭、劉等人主編第七期《大風通訊》，由郭撰寫的〈中國近代史的認識〉一文，底下列出「人物研究」清單，魯迅位列第一⁵。郭另於香港《盤古》雜誌發表〈阿Q與革命〉，這篇對魯迅的語氣模仿得維妙維肖的文章，則借助阿Q形象的多面性針砭留學生的文化⁶。

⁴ 本文對郭松棻「保釣小說」的定義，嚴格意義上僅指以保釣運動為主軸的〈冰蠶〉。然而考慮到郭的保釣敘事向來迂迴、隱蔽，典型的界定方式並不適用於郭松棻。除了「顯性」的保釣小說〈冰蠶〉，僅以一行寫及保釣的〈驚婚〉，以及繞道於魯迅／左翼的〈月印〉、〈雪盲〉等，也被本文視為隱性、間接反映其保釣意識之作，納入討論範疇。另外，須釋明本文對「保釣」和「左翼」的用法：郭所在的柏克萊加大，屬於北美釣運左翼重鎮，運動目標起初由釣魚台主權問題發軔，其後轉向以統運為宗旨的左翼運動。本文所稱保釣運動，即指稱郭所涉入的釣運左翼實踐歷程，在這個語境中，「保釣」與「左翼」在內涵上具有高度重疊性，而郭本人回溯保釣時也多半二詞混用，故不另行區分。

⁵ 郭松棻，〈中國近代史的再認識〉，《大風通訊》第7期（1970年5月），頁2。資料來源：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珍藏。

⁶ 鐵曇（郭松棻），〈阿Q與革命〉，《盤古》第36期（1971年1月），頁32-33。資料來源：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珍藏。文末註記完稿日期為1970年4月30日，可確認是保釣前完成的作品。

海外釣運爆發後，自始便接引五四資源，魯迅的革命宗師形象，在釣運左翼圈迅速獲得認可，吹響五四哨音的「黑暗的閘門」一說，更在各地保釣刊物被反覆抄錄，成為精神綱領⁷。保釣期間，郭以筆名發表的論述，也多次引用魯迅的話語，例如〈台獨極端主義與大國沙文主義〉開篇以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將知識分子的困境脈絡化，並援引阿 Q 的精神勝利法，比擬知識分子以民族主義情緒介入學術研究的情形⁸；〈黑暗裡的腿子們！——支持支加哥行動委員會反國民黨特務的嚴正立場〉揭露釣運遭到國民黨分化，以阿 Q 對性的態度，比喻捕風捉影的政治行動⁹。對魯迅文本的熟悉度，使郭在運動的不同語境下，均可能援用其話語資源，表達對政治的想像。

魯迅在釣運中的象徵意義既如此深遠，運動結束後，如何重新定位魯迅，遂成為關鍵的思想課題。對郭而言，魯迅的典範意義是雙重性的：既是政治、也是文學的前行者，為年輕的他演示，乃至賦予文學家以行動介入現實的合法性。魯迅的得與失，在在映照著革命的興廢。返回創作後，對魯迅「政治」的一面的反思，便成為郭與其運動經驗協商的重要介面¹⁰。

識者已指出，郭七〇年代末對沙特 (Jean-Paul Sartre) 與卡繆 (Albert Camus) 的研究，借途於西方哲學對中國與台灣的知識狀況進行反思¹¹。值得注意的是，這系列關於沙特與卡繆的思索，是以魯迅作為收束的。八〇年代初完成的未刊稿〈沙特在哲學倫理學留下的空白〉，在八〇年代西方哲學語境中重新指認沙特思

⁷ 《戰報》第一、二期均抄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黑暗的閘門」段落。魯迅的影響力不僅限於柏克萊，更是海外釣運左翼共同的認同對象，《洛城國是通訊》、《密西根月報》、《群報》、《歐洲通訊》、《水牛》等，皆曾刊登魯迅舊文或評論，甚至有刊物即命名為《吶喊》；系統性重讀魯迅的現象亦不止見於柏克萊，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中國學生研習小組曾花費四週研習魯迅。見美國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中國學生研習小組，〈魯迅的討論——從「阿 Q 正傳」看留學生的精神世界〉，《七十年代》第 18 期（1971 年 7 月），頁 46-49。

⁸ 郭松棻，〈台獨極端主義與大國沙文主義〉，收錄於李渝、簡義明編，《郭松棻文集：保釣卷》（新北：印刻，2015 年），頁 147-153。

⁹ 柯贊如（郭松棻），〈黑暗裡的腿子們！——支持支加哥行動委員會反國民黨特務的嚴正立場〉，柏克萊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編，《戰報》第 2 期（1971 年 6 月），頁 15。資料來源：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珍藏。

¹⁰ 郭的保釣同儕劉大任、李渝的後期寫作，也呈現類似的反思路徑。他們對魯迅的形象重構均在八〇年代中期展開，散文／雜文和小說多次與魯迅互文。詳待另文討論。

¹¹ 簡義明，〈行動者的哲學基礎〉，收錄於李渝、簡義明編，《郭松棻文集：哲學卷》（新北：印刻，2015 年），頁 12。

想的特色¹²，接著與中國的思想傳統和現代問題聯繫，聚焦於沙特對「叢集體」（series）的觀察，文末驟然引入魯迅：「沙特是社會發展的透視，而魯迅則是救中國。」¹³

郭以魯迅的行動實踐作為「沙特問題」的收束，勾勒出從左翼革命發散、向西方哲學取經，最終歸結於魯迅的分析路徑。後期郭從未發表專文討論他對魯迅的看法——對思想深微的小說家而言，越是重要的意識癥結，彷彿越傾向存而不論。但魯迅在這系列論文被呈現的方式，已頗具象徵性地揭示其於郭的思想體系占據的關鍵位置：郭在七〇年代以降對歷史和文學的整體性思索，是以魯迅所聯繫的中國現代性問題作為起點的。

郭的藏書與手稿，提供我們更多線索。遍覽李渝和郭松棻家屬捐贈給台大的藏書，郭從未在同代人或後輩著作留下註記，他所筆批者均為前人著作，其中重要軌跡之一，便是對魯迅的追尋。從藏書情況來看，李、郭在七〇年代末至八〇年代初，大量蒐購魯迅相關研究和評傳¹⁴，退出保釣，接引了系統性重讀魯迅的開端。其中，郭於1979年購入的曹聚仁《魯迅評傳》留下特別密集的批註。

曹聚仁並非典型的左派或右派文人。郭在眾多評傳中，特別傾心於立場不明確的曹聚仁，這樣的選擇是非常有意思的。不同於五〇年代其他將魯迅歸類為「左翼領袖」或「匪類作家」的傳記，曹意圖清除意識型態的障蔽，從「人」的視角還原魯迅——這當是保釣後郭極欲清理的思想癥結之一。書中劃記聚焦於魯迅加入左聯的解釋、對文藝和政治的看法，顯露其反思的主軸¹⁵。

¹² 陳湧漢，〈介入與他者的獻／現身——論郭松棻小說及《哲學卷》中的倫理實踐〉（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頁58-59。

¹³ 同註11，頁236。

¹⁴ 出版或購入時間介於此一時間段者，有馮雪峯《回憶魯迅》（1976年購入）、丸山昇《魯迅——その文学と革命》（1975年版）、鄭學稼《魯迅正傳》（1978年版）、林非《魯迅前期思想發展史略》（1978年版）、許壽裳《我所認識的魯迅》（1979年購入）、劉再復等《魯迅和自然科學》（1978年版）、曹聚仁《魯迅評傳》（1979年購入）、樂黛雲編《國外魯迅研究論集（1960-1980）》（1981年版）、劉再復《魯迅美學思想論稿：關於真善美的思考和探索》（1981年版）、張琢《魯迅思想研究》（1981年版）、任訪秋《魯迅散論》（1982年版）、鮑品《魯迅「國民性思想」討論集》（1982年版）等。儘管藏書與閱讀的行為未必同時發生，大量蒐購之舉，已說明他們在這個階段重新鑽研魯迅的意圖。

¹⁵ 曹聚仁，《魯迅評傳》（香港：新文化，出版年份不詳）。郭松棻1979年購於紐約。現存台大圖書館特藏資料區。

1997年春暉影業推出由雷驥執導的「作家身影」紀錄片，其中《魯迅：鐵屋外的吶喊》由郭撰寫旁述。郭在1996年展開相關工作，為此再次重讀魯迅，留下一批讀書筆記，從中可見，郭嘗試對魯迅後期放棄創作一事提出解釋。

如果七、八〇年代的劃記批註，聚焦於魯迅為何以及如何參加革命的思索，1996年重讀之際，郭所關心者可謂此一問題的延伸：重新檢討「魯迅投身革命，導致創作力衰退」的公論。郭提出新的觀點——與許廣平結婚，是致使魯迅創作生命中斷的原因：

自己的黑暗，到底在她面前要披露多少，魯迅，作為一個作家，早具有袒裸自己的勇氣。只是擔心她能了解多少，這與其事關男女之別，不如說是一個被大醬缸漿了半輩子的中年男人與青春力富的女人之間的差距，在這個新組成的家庭中，真正的戰士是許。

他努力地迎合她，一隻病弱的獅子，創傷累累，蒼蠅已圍在身旁。

……

成為丈夫——這是艱難至巨的「工作」。使他不斷處於情緒難平、心神不安的狀態，不可能從刻毒的腔調裡取得樂趣，老練的腔調不適於這位年輕的妻子。¹⁶

在郭看來，魯迅致力迎合許廣平，扮演丈夫的角色，然而中年的魯迅內心早已創傷累累；另一方面，儘管魯迅戰鬥的一面不適於家庭，兩人起初的師生關係與其盛名，使這段婚姻早難以擺脫一種被注視的眼光。為紀錄片所寫旁述，郭更為扼要地談到這點：

許廣平一直將魯迅看成是一位社會鬥士，而忽略了他文學創作背后的陰暗心靈。魯迅早已意識到文藝創作與社會批評之間的衝突。這個衝突隨著許廣平走進自己的生命而激化。結果是他（魯迅）選擇了社會批判而逐漸放棄了創作。¹⁷

¹⁶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6_13-0003。

¹⁷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7_22-0014。

一言以蔽之，「魯迅的『自我放棄』也許可視為結婚的最大禮物，是為愛（情）的犧牲」¹⁸。郭退出保釣後，選擇放棄社會批判回到創作，故而他格外在意昔時的革命宗師，在歷史關口上何以做出相異的抉擇。面對痛切的前車之鑑，郭敦促自己給出其他解釋¹⁹。無論郭的歸因是否具有說服力——正因缺乏充分的說服力，更能從中照見他反芻自身左翼經歷的矛盾情結。

如果釣運的路線分裂、權力鬥爭使理想主義蒙塵，難以直面往日記憶，郭對於形象擺盪於「政治」與「文學」兩端的魯迅之再詮釋，便成為其借徑梳理保釣的思想方案。郭對運動遺緒之反省未曾或已。八〇年代的小說〈月印〉、〈雪盲〉，與魯迅對話的面向，則呈顯有別於劃記批註和手稿的另一向度——典範的承續。

〈月印〉(1984)²⁰中蔡醫師的經歷與特質，處處令人想起魯迅：早年留學日、德，曾想棄醫從政，從事民族自決運動。透過鐵敏之口道出，蔡醫師不僅是醫者，更是一名帶有病理學家眼力的社會批評家。社會病理既為蔡醫師行醫的關懷所在，他犀利地指出鐵敏的病灶在於腦中的思想，直揭病體與國體的換喻。

小說頗費篇幅描述蔡醫師與鐵敏交換閱讀托爾斯泰的心得。蔡醫師因難以在病人臉上尋得《戰爭與和平》中「人性的眼光」感到迷惘。但真正令蔡醫師自苦的，並非病人的愚騷，而是自身的麻木不仁。從批註來看，郭對蔡醫師與魯迅的形象聯繫固有所覺，他在蔡醫師所述「也就常常對托爾斯泰感到憤憤然了」之「憤憤然」左側劃線，眉批：「一看到這三個字，就令我想到魯迅。」²¹

¹⁸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6_14-0004。

¹⁹ 而郭又不甘於「創作力衰退」的定論，引用茅盾將魯迅比擬成「預言家」的談法，指出婚後的魯迅依然抱持預言家的熱誠，將翻譯文學理論，定調為魯迅退而求其次地「兼顧了預言家和文學的使命」之舉。見「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6_13-0005。

²⁰ 依據郭的批註，〈月印〉篇名出自《朱子語類》：「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印萬川相似」。唐文標編，《1984 台灣小說選》（台北：前衛，1986 年），頁 175。現存台大圖書館特藏資料區；郭曾於致《中國時報》編輯的信件解釋題旨：「這男女之情的嫉恨，就是月虧的開始。沒有永遠的滿月，或者月影之無常，就是『月印』的主旨之一。」見「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116_13-0003。

²¹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102_12-0014。

如果蔡醫師的角色對魯迅偏向聯想性的承繼，〈雪盲〉(1985)則明確與魯迅互文。郭託名「董維良」所寫自評〈小說初讀九則〉²²，直指這篇小說「可以易名為〈向魯迅致敬〉」²³。

主人翁幸鑾自年少從小學校長手中繼承《魯迅文集》後，展開往後一生的精神苦尋。魯迅的符號，在〈雪盲〉座落的戒嚴時空浮現的過程，如同一道層層剝展的謎題。開篇寫到幸鑾在聯考後，隨母親探訪退休後棲居南方澳漁港的小學校長。當校長奮力將船隻推進海港，幸鑾獨自窩在窗邊閱讀一本「台灣總督府監印的舊書」²⁴。文中再次提及此書，揭露校長與幸鑾以授書為儀式，成為魯迅思想之傳遞者／接受者的關係：「他打開了老玻璃櫥，拿出了那本舊書。這是家裏唯一的一本中文書了，你就拿去看罷。你把書接過來。……」²⁵唯一的中文書，暗

²² 本文主張〈小說初讀九則〉為郭託名「董維良」所作，乃依據以下六項考證結果而提出：

- (1) 郭的手稿中有多篇〈小說初讀九則〉從草擬、反覆修訂到謄寫的版本，皆為郭一人的字跡。例如「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4_05-0002、094_12-0001、094_13-0007、095-01。
- (2) 〈小說初讀九則〉與郭1992年6月8日回覆吳達芸的信件內容有不少類同處；對孔乙己形象的看法，也可與簡義明訪談稿中郭的說法相為印證；「走異路」、「不返鄉」等觀點，又與郭1996年所寫筆記重疊。參閱「郭松棻手稿」(1992年6月8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4_10-0002~0003；「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6_12-0005。
- (3) 手稿中另有計劃出版卻未付梓的洪範版目錄，存有「董維良」評論〈西窗紀事〉的編目。〈西窗紀事〉是郭計劃改寫〈論寫作〉的預擬篇名。「董維良」預先評論了郭尚未完成的作品——這個「預先」，當是郭自己的設想。參閱「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170_01-0001。
- (4) 〈小說初讀九則〉文末所載董維良生平、學歷、任職與著述資料，以中英文關鍵詞於網路檢索，俱無所得。
- (5) 〈小說初讀九則〉的寫作風格、行文習慣與郭的作品相符。
- (6) 依據郭與前衛出版社當時的編輯林秀梅的通信內容，與「董維良」的一切聯繫乃至文章校對，皆由郭「代理」。參閱「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4_02-0006。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小說初讀九則〉是郭藉由他人名義對自己的小說進行解釋之作。那麼，郭何以要化名「董維良」撰寫自評？郭曾寫長信向吳達芸表達對〈齋恨含羞的異鄉人——評郭松棻的小說世界〉一文的異議，從時間點與內容來看，郭當是希望透過討論，促使吳達芸在付梓前修訂文章。不過，比對成書的版本，吳達芸並未採納郭的意見。本文認為郭寫作〈小說初讀九則〉，用意之一即是對吳達芸（與他所預見其他讀者）在他看來有所偏誤的閱讀方式之回應。這透露了郭與讀者溝通的欲望，其實比我們現今所認知的更為強烈。

²³ 董維良（郭松棻），〈小說初讀九則〉，陳萬益編，《郭松棻集》（台北：前衛，1993年），頁567。

²⁴ 郭松棻，《奔跑的母親》（台北：麥田，2002年），頁168。

²⁵ 同註24，頁171。

示這是校長持守的道統，作為亡兄留置沙灘的遺物，以絕對的禮物之姿過繼給弟弟的餘生，如今則交付到少年幸鑾手上。

這兩次描寫皆以「台灣總督府監印」代替書名。正式揭示《魯迅文集》四字，要等到全篇近尾聲處，從十七年後的異地沙漠回溯：「你把書接過來，讀著被蟲蛀了的書面：／魯迅文集 台灣總督府監印／就這樣，你第一次接觸到了魯迅。」²⁶

郭有意延宕魯迅的符號。關於幸鑾讀〈孔乙己〉的引述也採取相同手法，〈雪盲〉三度引用〈孔乙己〉原文，第一、三次局部重複。第一次引用的內容，為孔乙己抄書事業未能持之以恆，以致窮愁淪落的段落。幸鑾在海邊初讀此段，映襯老校長勞動的背景，與人物處境隱相呼應，而郭刻意截去前一句「孔乙己原來也讀過書」；第二次引用，則錄出酒店夥計重見孔乙己前的「瞬間」，夥計的視線銜接校長太太看見雨勢的場景，又特意截斷下一句「那孔乙己便在櫃臺下對了門檻坐著」。這兩次引用均避開對主語的稱謂。「孔乙己」正式登場，要等到〈故國〉一節的第三次引用。

對魯迅的延宕，既暗示其於戒嚴體制下禁而不絕，也迫使讀者將目光停駐在幸鑾對未知文本的摸索，突顯啟蒙的認知過程。這樣的懸宕，進而投射為幸鑾長大成人後，傾其餘生「尋找魯迅」的暗示。

依據郭的說法，以「雪盲」定題，是以眼疾者所見不實景象為喻，消解文中的自我否定姿態，構成雙重的反諷²⁷。郭 1992 年致吳達芸的信件，更直指〈雪盲〉全篇「都在說反話，都在聲東擊西」²⁸。這是理解〈雪盲〉的創作意圖至為關鍵的一點。

〈雪盲〉最初訂題〈中國，沉到底〉²⁹，小說數度寫及「往下沉」的意象，例如回台北的火車上，幸鑾閱讀魯迅：「你但願自己再也站不起來。讓雙手沾滿地泥，甚至讓自己的腿斷去。跟著手上的這本書一起沉下去……沉下去。」³⁰終章描繪幸鑾教完〈孔乙己〉失去行走的能力，與前景遙相呼應：

²⁶ 同註 24，頁 210-211。

²⁷ 同註 23，頁 580。

²⁸ 「郭松棻手稿」(1992 年 6 月 8 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4_10-0002。

²⁹ 「郭松棻手稿」(1992 年 6 月 8 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4_10-0003。

³⁰ 郭松棻，《奔跑的母親》(台北：麥田，2002 年)，頁 185。

你想像以孔乙己的模樣，用滿是污泥的手爬出教室，甚至讓自己的腿折斷，坐在地上一路跛著向前。現在這就是教室和停車場之間唯一可以頂天立地的行走方式。

……向著停車場走過去的胸臆及時萎縮成孔乙己，準備以殘廢的雄姿迎接在風中連綿幾百英里的金瑩閃亮的沙粒。³¹

傾落的肉身意象，貫串主人翁餘生的存有處境。然而郭要說的並非字面上的沉淪，相反地：

其實他不是逃避，他是在走「異路」這是魯迅的話！一般人是沒有精神生活的只是他走上了這條「狹路」……

我甚至還明白引述了張愛玲的一段「沉落」心得：

……

張愛玲並沒有要中國百姓逃避現實的意義，也不要中國真墮落。而是說：「如果要得到精神的拯救，那麼先沉到底罷。」這是我的解釋，我這篇小說原先的題目是：「中國，沉到底」

在這孩子看來，不沉到底，才是生活的致命傷，在海港歸來的火車上，孩子的精神冒險開始了。³²

依據郭的解釋，幸鑾的沉落實是走上精神追尋的道路——所謂「異路」的表現。藉由肉身沉墜，反向描摹一種意志上「頂天立地的行走方式」。這樣的「肉身—精神」對比，構成〈雪盲〉的核心概念。

更具體來看，幸鑾對魯迅的繼承，鎖定在對孔乙己的精神臨摹開展。論者多半從負面的角度解讀幸鑾對孔乙己的承接³³，但從雙重否定的手法衡量，這類解釋方式恐怕與郭的創作旨趣有一段距離。

³¹ 同註 30，頁 212。

³² 「郭松棻手稿」(1992 年 6 月 8 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4_10-0002~0003。

³³ 例如吳達芸，〈齋恨含羞的異鄉人——評郭松棻的小說世界〉，收錄於陳萬益編，《郭松棻集》(台北：前衛，1993 年)，頁 521；劉建基，〈愛與「癱瘓／麻痺」：論郭松棻〈雪盲〉中的喬伊斯幽靈〉，《文化越界》1 卷 4 期(2010 年 9 月)，頁 126-129；湯舒雯，〈史的暴

在郭看來，〈孔乙己〉本身即是以反諷手法寫成的作品³⁴。他認為孔乙己實是相當正面的人物，不止一次提到其在文學史上被「誤讀」的情形³⁵。郭在〈小說初讀九則〉指出，幸鑾初讀魯迅，便建立對孔乙己的認同感，魯迅真正要批判的並非孔乙己，而是造成孔乙己下場的社會³⁶。作為致敬之作，〈雪盲〉意欲針砭的亦非幸鑾的精神困境，而是其所置身——那個魯迅難以見容的時代。

走過失落的七〇年代，當心懷理想的少年流落異鄉，幸鑾對魯迅的思索，狀似如同外國學生的朗讀潰不成章，實際上從未放棄內在的品格，一言以蔽之，「魯迅自始至終對中國社會／國民性的不妥協（不返鄉）正是〈雪盲〉的主人公默默地試著在繼承的人格。」³⁷

再者，目前關於〈雪盲〉的討論，有個問題較少被觸及：論者多聚焦於〈斜陽〉、〈故國〉與〈孔乙己〉的互文，〈人間〉一節對〈阿 Q 正傳〉的互文，又蘊含什麼樣的意義？

幸鑾與詠月的戀情處處照映〈阿 Q 正傳〉。〈雪盲〉初次提到魯迅二字，正是藉由詠月的提問帶出的。幸鑾因打工受傷，與詠月歡愛後有如下對話：

「魯——迅，」她翻著你的那本舊書問道。「他是誰？」

「是一個作家。」

「好看嗎？」

「好看。」

她翻著看，翻了兩次。看到每一頁在相同的地方都有一模一樣的蛀洞，她把書合起來，放回原處。

「幸鑾，不要想得太多。」³⁸

力，詩的壟斷——台灣白色恐怖的文學見證、癡候閱讀與文化創傷〉（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頁69。

³⁴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4_11-0002。

³⁵ 簡義明，〈書寫郭松棻：一個沒有位置和定義的寫作者〉（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頁187；舞鶴訪談，李渝整理，〈不為何為誰而寫——在紐約訪談郭松棻〉，《印刻文學生活誌》1卷11期（2005年7月），頁48。

³⁶ 郭松棻著，陳萬益編，《郭松棻集》（台北：前衛，1993年），頁579。

³⁷ 同註36，頁570。

³⁸ 郭松棻，《奔跑的母親》（台北：麥田，2002年），頁189。

魯迅正式登場，竟夾纏於主人翁羈旅異鄉的愛欲片刻。倘若幸鑾背負傳承的重荷，不知魯迅為何許人的詠月，則以其未啟蒙狀態，天真地訕笑了歷史的憂鬱。肉身的創傷與歡愉，竟而顯露幾分國殤的意味。這是病體與國體互相轉義的極致了，詠月未能生下的孩子，更示現道統的飄零。

詠月服下墮胎藥後，兩人同遊印第安保留區：

在印第安人的保留區，看著她的臉，你想起了吳媽。……

「吳媽是誰？」「吳媽是魯迅寫的一個軟心腸的女人。」

站在旅舍的露台上，你突然了解到，再沒有像吳媽那樣一對無辜的眼睛了。以致於阿 Q 在赴往刑場的車上突然有了唱一支歌給她聽的意思。³⁹

〈阿 Q 正傳〉中吳媽的角色向來存在爭議：她是革命的受益者、反對者抑或嘲諷者？是否如同其他看客麻木不仁？吳媽旁觀阿 Q 行刑的反應，亦存在多種解釋的可能，而郭所取義的，是其「軟心腸」的一面。

郭對「軟心腸」一詞的概念，可能來自其師夏濟安。李渝、郭松棻藏有夏濟安《黑暗的閘門》英文本⁴⁰。第一章瞿秋白專論，副標為“The Making and Destruction of a Tenderhearted Communist”（一名軟心腸共產主義者的煉成與毀滅）。夏濟安談到，相較於以共產教條成功重塑自身人格的「硬心腸」（hardhearted）共產主義者，「軟心腸」（tenderhearted）的共產主義者，揭示了“the feelings and thoughts of a Communist in bewilderment”（陷於困惑的共產主義者內在的感受與想法），該句底下劃線⁴¹；夏濟安指出瞿秋白人格的兩面性，便在於「軟心腸」與「革命意識型態」的扞格，劃記則將兩部分連接，註明這是中國共產黨（CCP）的缺點⁴²。

在夏濟安的脈絡中，「軟心腸」是和典型共產主義者對立的概念，描述個體尚未被革命教條徹底收編的狀態。郭雖未必亦步亦趨追步乃師，很可能在有意無意間接引了「不是」左派的意義。

³⁹ 同註 38，頁 191。

⁴⁰ 1969 年 3 月郭將夏濟安《黑暗的閘門》英文本送給李渝。書上的筆跡難以確認出自李渝或郭松棻。作為贈書，本文傾向將《黑暗的閘門》的劃記批註，視為兩人共同閱讀的痕跡。

⁴¹ Hsia, Tsi-An, *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 p. 5.

⁴² 同註 41，頁 8。

幸鑾意識到，詠月之於他就像吳媽之於阿 Q，儘管難以理解他們所追求的價值，依然懷抱一種母性的同情。而吳媽與詠月身上，那未經啟蒙、幾近反智的純善，諷刺地令幸鑾照見了時代的癥結所在——世上還會有許許多多的吳媽和詠月，他的精神苦行因之將無所休止——故而不忍苛責地感到悲哀。

1985 年的郭，在小說中塑造了一名傾其餘生堅守對魯迅的信仰的主人翁。文學中的魯迅，成為知識分子理想主義的最後堡壘。發表〈雪盲〉同年年底，郭參與《台灣與世界》雜誌主辦的「保釣運動回顧」座談會，寫下發言稿〈保釣追憶錄〉（1985）。這篇發言稿的內容，可謂以論述的形式對〈月印〉、〈雪盲〉觸及的國民性與知識分子實踐等問題做出回應。

在這篇文章中，郭從省思文革的角度展開對保釣的追溯，他將釣運定位為中國現代化啟蒙運動的一環。在郭看來，保釣運動及中國其他政治運動的成效，皆受限於民族素養的缺乏，故保釣的民族主義只達到排外之效，未能改變受到魯迅所謂「拿來主義」控制、內部民族意識萎弱的情況。現下首當其衝的問題，便在於如何提升國民性。郭引述魯迅《華蓋集》、《兩地書》，說明中國在精神上仍處於待啟蒙的「前現代」狀態，呼籲保釣人士加以深思⁴³。

〈保釣追憶錄〉一方面點出保釣運動的弊病，一方面倡議以「新啟蒙」作為解決之道。這樣的內容其實更像七〇年代——而非已經過沉澱的八〇年代的表述。若將〈保釣追憶錄〉與〈雪盲〉、〈月印〉參看，從中疊影出的精神圖像委實耐人尋味：郭一方面安排小說人物以孤獨的傳承者姿態，曝現理想主義的失落，另一方面卻又援引革命宗師，回到時間的前沿重新提出啟蒙話語。這畢竟透露了郭繞道於魯迅，試圖清理其左翼經驗，卻難以竟其全功之處。

在此，本文將進一步指認〈雪盲〉中一組重要的匱缺，以接續下一節的討論：作為「傳承魯迅」的文本，關於幸鑾的敘事，刻意跳空了與詠月分手後的七〇年代。青年幸鑾懷抱對魯迅的信仰，在留學期間究竟遭遇了什麼？由此介入，將觸及小說家隱而未言的，關於「魯迅」的符號真正指涉的歷史內容。

⁴³ 李渝、簡義明編，《郭松棻文集：保釣卷》（新北：印刻，2015年），頁374-375。

三、左翼的借代：《驚婚》

在郭後期的小說中，七〇年代總是缺席的。這段被隱匿的時間以十年或十七年為度：〈草〉的敘事者學位延宕十年；《驚婚》亞樹不告而別，再度與倚虹聯繫已是十年後；〈雪盲〉、〈奔跑的母親〉，主人翁十七年未曾返鄉。他們的生命經驗座落的時空，常以郭自身的時間軸為藍本，〈雪盲〉更將幸鑾出國的年分標示於1966年。這段消失的十年／十七年，因此有了清楚的切分點：始於六〇年代末，延伸到七〇末八〇初……從中掩蔽了七〇年代。

在郭公開發表的小說中，唯一直面七〇年代者僅有〈論寫作〉。然而這篇小說堪稱郭的作品最「不政治」的一篇：主人翁是一名藝術家，終身追逐形上的真理——「政治化的七〇年代」，才是敘事的禁區？

然而這並不意味七〇年代不存在。郭總是隱晦地勾勒出一組關於七〇年代的括弧，小說中人向前或向後展開記憶的回溯——七〇年代正是以其「不在場」的形式，於郭的小說成為歷史的見證。本文認為，在郭的小說視域裡，七〇年代實非位處邊陲，相反地，是他意欲探問的核心——那是一種環繞著七〇年代的空景開展的寫作。

幸鑾1966年赴美，與詠月相戀，其後分道揚鑣。再次登場，已是孤困於沙漠警校的晚年。小說中的「七〇年代」被截斷了——這是一篇以七〇年代為問題意識，卻抽空七〇年代實軸的文本。但郭已給出相當明確的線索：一名自幼受到魯迅啟蒙的左翼青年，在學潮最熾烈的年代留學美國——不妨更直接地問：幸鑾是否參與了保釣？

這段敘事的空白，顯然是郭刻意為之的安排。嘗試實踐魯迅教義的七〇年代，終以失敗告終，精神宗師在對岸被神化，在島嶼這端則仍是禁忌，「回到你的國家，你也教不了你的魯迅」⁴⁴——回到你的國家，你也救不了你的國。

那麼，倘若換一個敘事，羈旅異鄉的遊子回到了家鄉呢？〈草〉最後一句：「他因涉嫌叛亂，被判刑入獄。」⁴⁵小說末了，讀者方驚覺，敘事者眼中沉湎於

⁴⁴ 郭松棻，《奔跑的母親》（台北：麥田，2002年），頁211。

⁴⁵ 郭松棻著，陳萬益編，《郭松棻集》（台北：前衛，1993年），頁218。

形上學的神學院研究生，原來參與了政治運動。郭剪去七〇年代的內核，僅以黑格爾和《德意志意識形態學》作為線索。幸鑾或神學院研究生的左翼經驗，俱被隱藏在敘事軸線後。然而，本文意欲進一步追問，七〇年代在郭的小說中，真的只以空景的形式存在嗎？

周知郭對一九四九念茲在茲，他的小說總含藏一道由戰後回眺戰前的目光。考察郭的身世，他與白色恐怖的關聯是雙重性的：孩提時期住在大稻埕，親眼目睹二二八發生，七〇年代則因參與保釣遭到國民黨整肅。郭追索白色恐怖的動力，不僅來自童年的見證，更源於切身的受迫害經驗：被《中央日報》點名為「共匪特務」⁴⁶，示威會場有不明人士噴漆書寫：「毛賊學生 走狗 郭松棻」⁴⁷，遊行時遭毆打成傷⁴⁸，列入黑名單不得返台……

郭鮮少直述這些經歷。保釣的時間塌陷了。誠然，在表面的言說中，郭經常否認保釣的意義，甚至從自行編輯的前衛版寫作年表特意隱去⁴⁹，這樣的「拒認」姿態反而耐人尋味——在後革命的廢墟中，七〇年代仍是情感上越不過的斷崖，詞語的禁航地帶。

有沒有這麼一種可能呢——郭其實是從保釣的抒情政治學，嫁接到了對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追尋。亦即，在郭的部分敘事裡，隱含了一組戰後初期與七〇年代的對應結構，保釣曲折地構成了那雙重歷史景深的來源。

從郭的小說、論述與訪談，可找到相應的線索。他關心的白色恐怖內涵，向來指向右翼政體對左翼知識分子（而非外省人對本省人）的壓迫脈絡⁵⁰。〈月印〉鐵敏被處刑，並非導因於本省出身，而是參與左翼活動⁵¹；〈台獨極端主義與大國

⁴⁶ 中央社舊金山六日專電，〈周形華籲僑社警覺 謹防野心分子 破壞愛國運動〉，《中央日報》，1971年4月8日，第2版。

⁴⁷ 同註43，頁5。

⁴⁸ 簡義明，〈書寫郭松棻：一個沒有位置和定義的寫作者〉（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頁153。

⁴⁹ 同註48，頁143。

⁵⁰ 陳建忠曾注意到這點。陳建忠指出，左統認同是郭文學關懷的起點，其二二八史觀總以左翼人士切入，呈現「過往信仰頑固的餘響」。陳建忠，〈流亡者的思想病歷——郭松棻的文學道路〉，《中國時報》，2005年7月17日，B3版。

⁵¹ 這可與李渝的白色恐怖小說參看。〈夜琴〉、〈夜照〉皆以外省人為主角，李渝在訪談中憶述白色恐怖，是「外省人每一家都是可能有人失蹤的」的事件。鄭穎，《鬱的容顏——李渝小說研究》（台北：印刻，2008年），頁182-183。

沙文主義〉反對以省籍分化的角度解讀二二八，突顯馬列主義的革命觀點。2004年接受舞鶴訪談再次強調這點⁵²。黃錦樹也注意到，〈今夜星光燦爛〉隻字未及二二八事件，反而將陳儀定位為左翼革命的受難者⁵³。

本文認為，郭對戰後初期的眺望，實以白色恐怖的左翼內涵為引線，嵌入對七〇年代的追尋。這不僅停留在隱喻性的層面，郭逝世前委託李渝著手整理的小說《驚婚》，便揭露此一重層架構的聯繫。

《驚婚》初稿完成於八〇年代初，約與寫作〈月印〉同時⁵⁴。2005年李渝協助整理、繕打，因郭去世暫停，2011年完成並發表⁵⁵。小說以倚虹和亞樹的婚禮為起點，追索父親們的歷史。故事圍繞著二二八的負疚者展開：亞樹的叔叔們均死於二二八，亞樹不能原諒父親苟活，在一次爭吵導致父親腦溢血逝世後，親負墓碑贖罪；而倚虹的父親就讀師範學校時，與同學聯手攻擊日本學監，不意在法庭上，學監翻供，逃過一劫的少年們卻相繼死於二二八，父親一意孤行地照顧受難的蘇醫師留下的遺孀與幼子，致使家庭破碎。

作為負疚者的下一代，倚虹與亞樹起初均不能理解他們的父親。兩人相遇，則啟動從彼此的身世尋索答案的契機。亞樹的到來，使倚虹的父親開口說出自己的故事。老人逝世後，亞樹引以為咎，不告而別出家，再次與倚虹重逢，已是十年後的異鄉。

就敘事主軸來看，二二八是小說中層層密織的歷史網絡之源。不過，請留意亞樹和倚虹在美重逢的細節：

⁵² 舞鶴訪談，李渝整理，〈不為何為誰而寫——在紐約訪談郭松棻〉，《印刻文學生活誌》1卷11期（2005年7月），頁50。

⁵³ 黃錦樹，〈詩，歷史病體與母性——論郭松棻〉，《中外文學》33卷1期（2004年6月），頁107。

⁵⁴ 簡義明，〈書寫郭松棻：一個沒有位置和定義的寫作者〉（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頁178。

⁵⁵ 由於編輯工作，《驚婚》也在一定程度上滲入李渝的創作意志。依據〈謄文者後記〉，文中多處空白，由李渝依據筆批的提示，結合她對郭的創作思路與文學風格的了解，加以組織。不過，比對成書版本與手稿的差異，李渝的編輯工作不止於此：細部的刪改最為常見，例如小說頁92「身子被背後的窗暉映出陰沉的黑影」原稿作「高大的影子被背后的窗暉照出陰沉的黑影」；新添的句子，例如頁42「和睡眠中的清醒」，手稿本無此句；或段落與插入句順序調動，例如頁93第一、二段語句順序與原稿不同；頁21「後來留宿的問題是由他（她）提出來的」、「能不能過來看妳」原先次序顛倒。

我可以不可以過來看妳？還是若無其事的口吻。你一個人嗎，不，他是一群人，開著一輛舊車，橫跨美國而來的。……跳下車的那個人不就是亞樹嗎？一部濃密不馴的長髮在風中翻蕩……

能不能過來看妳，能不能在妳的地方宿一夜，大家都帶著睡袋，吃睡都不用妳操心。……

樓下的客廳充滿了汗臭，他們幾天沒洗澡了。其實天天都洗的，他說。不過他們在趕路，吃宿很隨便。聽說他們為了一些地圖上找不到的小島嶼在奔走運動，怕又被日本人佔去了。⁵⁶

一名留長髮的青年，為政治奔走、過集體生活——這是典型的釣運左翼青年形象了。但《驚婚》全篇提及保釣處僅止於此。釣運宛如歷史的擦邊球，從讀者眼前一閃而逝。故事又回到了二二八，回到倖存者餘生的搏鬥。

然而這個片段濃縮了亞樹離散的十年。左翼的七〇年代。甚至亞樹再見倚虹，最初的動機不為重逢，而是解決革命的住宿問題。透過亞樹一角，《驚婚》連結了二二八與保釣：那是橫渡戰後初期到七〇年代，從戒嚴台灣到冷戰美國，一道左翼的風景線。小說家的精神癥候，顯露在如此瞬息即逝的片刻，以斷裂與匱缺，訴說了未能直面的故事。

但更仔細地考慮，《驚婚》也未必是那麼隱晦的文本。〈雪盲〉的詠月到《驚婚》再度現身，成為倚虹的室友。原先由幸鑾角度進行的敘事，到《驚婚》轉從詠月的觀點，追溯往日情事。詠月屢次對倚虹談到幸鑾：

你不能想像沙漠是那麼的寂寞，你也不能想像一個人會為了一本書整個沉迷下去。我是不應該離開他的，可是那時誰懂得這些。一心只想早點離開那片沙漠。⁵⁷

詠月與倚虹的談話，總圍繞著與幸鑾和亞樹的往事。她們活在戀人的舊日記憶裡，喪失正常的時間感，栩栩如生的過去置換了當下的意義。而《驚婚》與〈雪

⁵⁶ 郭松棻，《驚婚》（新北：印刻，2012年），頁20-21。粗體為筆者所加。

⁵⁷ 同註56，頁19。

盲〉互文的關鍵便在於，詠月與倚虹作為負載他者記憶的說書人，幸鑾與亞樹所牽涉的歷史網絡——二二八、魯迅、保鈞，透過她們的互訴，成為一組互相詮釋與補充的歷史文本⁵⁸。

在詠月與倚虹的談話裡，亞樹與幸鑾以複數的型態存在，「他們都是作噩夢的人」、「只是不知他們和什麼在糾纏」⁵⁹。當詠月談起幸鑾，倚虹勢必以此參照亞樹，反之亦然。承繼校長亡兄遺志的幸鑾，與投入保鈞的亞樹，以自身的故事補白另一方未盡的部分，儼然成為一對歷史的雙生子。

當然，本文並非主張《驚婚》「不是」一篇關於二二八的文本，而是從二二八的歷史蕊心，延伸了通往保鈞的線索，構成以左翼為經、白色恐怖為緯的重層敘事。

下一節，本文將聚焦於郭生前未曾發表的保鈞小說〈冰蠶〉，直面小說家與記憶的搏鬥。

四、被塵封的保鈞小說——〈冰蠶〉

在郭的手稿中，存有題為〈保鈞自傳〉和〈保鈞回憶錄〉的創作計畫，三島由紀夫《太陽與鐵》為郭構思這兩篇作品的重要參照。從李渝、郭松棻所藏《太陽與鐵》出版於1986年推斷，〈保鈞自傳〉、〈保鈞回憶錄〉可能是這個階段留下的手稿。

〈保鈞自傳〉的內容為一頁A4筆記，摘錄《太陽與鐵》文末所附日本評論家田中美代子〈解說〉的觀點，田中美代子提到，作品的形成涉及「撰寫的自我」與「被撰寫的自我」的鬥爭⁶⁰，並為三島由紀夫所言「或許我就是詩的本身」作註，指出「他首先以詩人的身分來寫作，同時以自己的血肉來充滿作品，然後成

⁵⁸ 〈雪盲〉所致敬的魯迅，雖未於《驚婚》直接顯影，多處描寫仍足以引發聯想：圍觀蘇夫人軀體的「閒人」；倚虹的父親將教職生涯未能找到心愛的學生，歸咎為「整個民族的不幸」。《驚婚》更重構保鈞世代對光明與黑暗的應許，改寫「黑暗的閘門」的啟蒙／革命意義——倚虹之父因負疚厭倦光明，認為蘇家的黑暗才是「事變以後，人該去的地方」，到蘇家贖罪使他得見後半生「唯一的光輝」。

⁵⁹ 同註56，頁66。

⁶⁰ 三島由紀夫著，劉華亭譯，《太陽與鐵》（台北：星光，1986年），頁142。

為對現實射精的詩的本身。」⁶¹這些觀點構成郭面對〈保釣自傳〉的出發點：自傳體的「告白」是否可能，以及自我揭穿的意義和代價。而這篇自傳的構思，又扣連到〈月印〉的重寫計畫⁶²。

〈保釣回憶錄〉則僅有兩行筆記：「直到那一天（第一章第一節述陳世驤夫婦送雞湯）我一直是憑窗期待稀奇的事變在某處發生的少年。（三島：《太陽與鐵》p. 40）」⁶³。《太陽與鐵》該頁內容，描述敘事者年少時期待世界有所改變，內心騷動不安的狀態。陳世驤為郭就讀柏克萊加大期間的指導教授，於郭松棻、劉大任等人赴美之初對他們多所照顧，在運動中因發言支持國府，淪為釣運青年的批判對象。在〈保釣回憶錄〉中，陳世驤夫婦的形象遂以（重視倫理關係的）送雞湯之舉為象徵，構成與「事變」性質相異的存在。

然而這兩份創作計畫畢竟沒有落實，難以充分說明郭對保釣的反思與再現。在郭的手稿中，唯一初具雛形的保釣書寫，是可能寫於八〇年代中期的中長篇小說〈冰蠶〉⁶⁴。〈冰蠶〉的手稿由大量未經整理的筆記組成，又考慮到郭反覆修訂的習慣，難以確認小說家對這篇作品的完整構思。本文僅能嘗試掌握與保釣相關的部分，進行初步討論⁶⁵。

依據郭的筆記，〈冰蠶〉典出《拾遺記》卷十：

⁶¹ 同註 60，頁 145。

⁶² 其中一行寫道：「麗雪：他們（鐵敏、葉慕石）對著現實射精后帶來的心血耗損感到心疼。」麗雪和葉慕石是郭計劃擴寫〈月印〉加入的角色，這或可視為戰後初期與七〇年代，以左翼為線索有所聯繫的又一例證。此外，郭也曾考慮以〈月印〉命名〈冰蠶〉。他對「月印」意象的發揮，總放在左翼的語境中。見「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151_07-0004、189_10-0012、189_16-0007。

⁶³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151_07-0003。

⁶⁴ 郭為〈冰蠶〉蒐集的多篇剪報年分均為 1984 至 1986 年間。再者，郭的小說背景經常與現實時空對位，〈冰蠶〉主人翁澤南生於 1938 年，和月英在敘事當下俱為四十來歲，以起筆於八〇年代比對，與郭彼時的年齡相符。

⁶⁵ 本文對〈冰蠶〉的小說脈絡理解可能有所偏誤，尚祈指正。初讀手稿比較困惑的部分，是編號 188 和 190 的資料夾裡，關於物理學家年會、猶太教授與皮爾金和一杯茶的段落。這裡的脈絡和前面明顯有別，敘事者研究物理（而非澤南主修的生物），妻子是畫家（月英是圖書館員）。然而這批手稿部分也以〈冰蠶〉定題。郭可能先寫了一篇以保釣為主軸的小說，再借用其中的元素，另外發展出以科學家為主體的故事。這並非郭寫作習慣的特例，從手稿可看出，郭經常在現有元素之上延伸創作、開展新局，〈論寫作〉的系列手稿也有類似情形，例如「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177_04-0005、177_04-0007。

員嶠山……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為文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經宿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堯以為黼黻。⁶⁶

冰蠶是古代傳說中的一種蠶，據說以這種蠶絲織成的錦布，不怕水浸也不懼火燒。郭並未解釋何以用〈冰蠶〉命題，其中一頁小標為〈父親的無聲中的叨絮〉的手稿，或可提供我們解讀的線索：

若斷若續的 喋喋不休的

聲音蠶食著曠野

不是起於一個聲源的，而是由四面八方蠶野而來的

……

由於從小隨伴著，他就不去追究那是什麼。

……

直到有一天，他知道了那就是父親洶洶不絕的雄辯……⁶⁷

郭將冰蠶的視覺形象聽覺化，主人翁長年聽到蠶食曠野的聲音，即是父親在他生命中留下的召喚。〈冰蠶〉的敘事主軸，聚焦於外省將軍與兒子的兩代經歷。部分元素與〈向陽〉近似⁶⁸。在〈冰蠶〉中，這位老將軍姓傅，官拜軍團司令陸軍一級上將，曾寫血書反對國民黨撤退，來台後因此被迫退休，鬱鬱不得志，終日自困於書房；兒子澤南⁶⁹自小與父親關係疏離，赴美留學後涉入保釣，被列為黑名單，先在安那堡密契根大學主修生物，再移居紐約，退出運動後於大學任教，1978年前後曾擔任交換教授前往米蘭一年⁷⁰。

⁶⁶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189_31-0003。

⁶⁷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185_08-0001。

⁶⁸ 例如男女主角年少時在合歡山與橫斷公路的描寫，或男方的父親為國民黨老將軍、女方的舅舅經營鋸木廠等。

⁶⁹ 手稿中澤南的名字另有多種版本：南澤、亞南、仲南、頌南、蔚南等。本文統一採用「澤南」。

⁷⁰ 本文對此一時間點的判斷，來自手稿提到義大利總理阿爾多·莫羅(Aldo Moro)被左翼組織「紅色旅」(Brigate Rosse)綁架殺害。見「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189_24-0003。

父親對兒子投入保釣不能諒解，認為他「上了共匪的當」。小說著意穿插父子不同世代的觀點，就篇幅來看，對父親的描寫，甚至略略超過澤南的釣運實踐——郭似乎有意以對前行世代的回顧，作為重新介入保釣的方法。

郭為撰寫〈冰蠶〉蒐集的資料中，有一篇評論《鄧小平文選》的剪報，郭劃記了文中所引馬克思〈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的段落：

一切已死的世代的傳統，好像夢魘一般地壓著活人的頭腦。當他們好像是從事於變革自己……從事於創造全新的事物時……他們焦心地召喚過去的亡靈來為自己效力，向其借用名稱、戰鬥口號和服裝，以便穿著古老服裝，說著借來的詞句，來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⁷¹

如果革命在創新的表象下，實則向過去承繼的條件借取資源，反思的路徑，也從昔時顛覆的內容重新開展。小說中，兒子「在尋找父親的不幸中尋找自己不幸的理由」⁷²，甚至，澤南自認一生追尋的答案不在保釣，而是父親的歷史：

他已經說過，使他激動的不是他自己周身的東西而是他——他的父親——在大陸的生涯，仿佛台灣一切都是幻影。而那她一無所知的以往的大陸生活才是真實的，才會耗費他的心神。他可以歷歷如繪說出那山川他從未見過的部分，只因那是在尋找父親的足跡。⁷³

澤南對父親的態度始終是矛盾的。年少的他一方面想擺脫父親的歷史包袱，另一方面又在渴望聆聽父親的故事、親近父親的心理下成長，由此型塑往後一生的性格與氣質——這幾乎是篇尋父乃至戀父的文本了。退出保釣後，澤南遂以父親的經歷作為思想求索的解答。郭筆下向來失蹤、沉默的父親們回到敘事的前沿，曝現記憶，成為離散子嗣畢生尋覓的救贖。

⁷¹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186_03-0001。

⁷²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185_21-0003。

⁷³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185_14-0002。

〈冰蠶〉另一組敘事軸線，則由妻子月英的角度追憶保鈞。兩人因參與救國團的活動邂逅，月英赴美初期留學加州，計劃未來回台北教書。保鈞期間，與十餘名婦女共同組成「晨社」，後任職於紐約市立圖書館。

如果澤南從世代的角度介入保鈞，以梳理父子關係作為對革命經驗的回應，月英對政治行動的反思，則與私領域的親密關係密不可分。在她看來，保鈞拯救了她與澤南搖搖欲墜的事實婚姻，退出運動後，兩人的關係再度降到冰點。關鍵之一便是省籍的扞格⁷⁴。月英自始遭到澤南父母的歧視，澤南的母親又因兩人無子，不斷要求澤南離婚。此外，月英也觀察到，社會主義的階級平等觀，不足以翻轉澤南根深蒂固的父權思想⁷⁵。

郭其他小說中的病體往往為男性，月英則是文本中那罹病的女人。肉身與精神互為隱喻，在這樣的婚姻中，月英生下身心不全、被盼望得子的夫家刻意取男性化名字的女兒小祥，小祥的匱缺，宛如上一代心理創傷的示現。

值得注意的是，〈冰蠶〉對保鈞前台灣社會氛圍的刻劃，與劉大任以六〇年代為背景的長篇《浮游群落》頗為不同，月英與澤南的六〇年代政治氣息並不濃厚⁷⁶，甚且沉迷碟仙。

在郭筆下，未必源遠流長的理想轉瞬成空，在時移事往後，變成一種鮮明的諷刺。〈冰蠶〉對保鈞的態度毋寧是悲觀虛無的，著眼於運動的內部鬥爭，與利益、權力的掛鉤，對運動者紛紛入職聯合國的決定亦多所嘲諷：

「你們都進了聯合國，把革命一丟就走了。」

革命沒有在任何地方產生。⁷⁷

「他們都不再革命了，他們躲進聯合國裡。」⁷⁸

⁷⁴ 〈冰蠶〉對省籍衝突多所著墨，這是頗不同於郭其他作品之處。

⁷⁵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189_14-0016。

⁷⁶ 儘管他們在台時便已接收到越戰的消息，皆未涉入政治活動。唯一在赴美前已展開行動的，是月英的哥哥，經常赴三重埔的老友家聚會。其後他們從保鈞刊物得知，這位老友因涉嫌叛亂，被判處十年徒刑——類似的情節也出現在〈草〉的結尾。

⁷⁷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189_07-0013。

⁷⁸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189_19-0009。

不過，〈冰蠶〉雖否定保釣的成效，與此同時，又突顯少數運動者不求個人名利的奉獻。對郭而言，「道德」似乎是重估保釣時相當重要——甚至唯一的價值依據⁷⁹。那無涉權力的部分，成為事過境遷後，主人翁頻頻回首的焦點。小說對這些層面的著墨，均由月英的角度進行。比如逛超市購物，想起運動時大家共餐的情景⁸⁰。或回想遊行時刻：

運動過去了。現在只剩下運動的回憶。那些臉龐漸漸模糊了。然而她不會忘記那昂奮的吼聲。在聖家堂前的那座廣場，中國人的臉在兩排法國梧桐下映著地上的雪。

她夾在人群中，自己感到變了一個人。⁸¹

這段文字令人想起李渝〈關河蕭索〉的結尾。「中國人的臉」，這是保釣世代從魯迅處共同承繼而來的一組意象——那畢竟是重要的啟蒙時刻，無論成敗為何，其意義並未全然湮滅：

那是罕見的場景。罕見的臉——中國人的臉，第一次變得可愛起來。「將來的記述中，無論如何，那是一個偉大的運動。」哥哥從加拿大的來信中，曾經這麼提到。十年以後，她慢慢感到它的力量，那是幾乎席捲了她的青春的。事後想起來，還是讓她整個人戰慄起來。⁸²

保釣遺緒，終究型塑出一種長遠的、觀看世界的模式。小說多次寫到月英和澤南在日常中對工運的關切，例如親眼目睹歐洲工運，在米蘭聽聞義大利工運情形，搭火車時注意到紀念碑並未記載華工的貢獻，或月英得知近期葡萄工人的罷工行動，阻止婆婆買葡萄……等。左翼的血脈畢竟斷而不絕。

⁷⁹ 這也流露在郭松棻和李渝對早逝的運動夥伴戈武、唐文標的追憶。梅家玲、楊富閔、鍾秩維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18 李渝》（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9年），頁116-117；簡義明，〈書寫郭松棻：一個沒有位置和定義的寫作者〉（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頁172。

⁸⁰ 同註77。

⁸¹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189_17-0013。

⁸²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189_07-0010。

〈冰蠶〉耐人尋味之處，便在於這種對保釣難取一義的矛盾。其中一處重寫很能說明這點。談到月英對保釣的懷想，郭原先寫道：「現在她回想起來，難免覺得自己有點幼稚」，後改成：「現在她回想起來，過去曾經那麼熱情，那麼年青，那畢竟是一種鮮明的記憶。」⁸³既認同又否定、既眷戀又質疑的情緒，標記了郭寫作〈冰蠶〉當下，在思想上清理保釣的「未完成」狀態。

「運動過去以後」、「後來運動來了」、「那時運動也過去了」、「運動過去了」，這類敘事因之反覆出現。保釣既是歷史主體標記過去的依據，卻又歧斷、塌陷，難以銜接往後的歲月。在七〇年代一系列反思社會主義的論文之後，革命的遺緒，終究有其無法理論化，也無法被理論總結之處。

這樣的思想癥結，直接地映現為〈冰蠶〉的美學困境。平心而論，〈冰蠶〉的藝術性並不高。與郭其他公開發表的作品相較，這篇手稿幾乎偏離郭所有標誌性風格：敘事直白淺顯，人物性格扁平，對歷史的詮釋也流於僵化。郭的小說中那向來為人稱道，以詩意眼光介入人性的晦暗、生命的無明，由此隱喻戰後台灣精神史的力道，全然消失了。

然而〈冰蠶〉作為郭小說美學的異數，值得推敲之處正在於此。如果保釣的頓挫，使郭開展出有別於台灣主流現代主義的歷史性維度⁸⁴；當他重返歷史追尋的原初場景，反而因缺少迴圓的空間，撞入意識型態的枷鎖，淪為詞語的俘虜。藝術化的困境，揭露了思想的陷溺。

郭對這樣的局限當不無自覺。〈保釣自傳〉、〈保釣回憶錄〉的夭折，乃至郭對頗具規模的〈冰蠶〉手稿的捨棄，說明其嘗試「告別保釣」的姿態——此一塵封之舉，象徵性地揭開了郭後期書寫的新頁。

縱然保釣的傷痕未曾撫平⁸⁵，郭切換了凝視的焦距，將七〇年代轉成小說中一道隱蔽的傷口。也正是這道傷口所鑿出的景深，使更後來的郭對歷史的

⁸³ 同註 81。

⁸⁴ 劉淑貞，〈論寫作，以及它的匱缺：論郭松棻的小說〉，《中山人文學報》第 44 期（2018 年 1 月），頁 36。

⁸⁵ 這樣的困境直至郭逝世未曾消解。2004 年郭先後接受簡義明和舞鶴訪談，均談到保釣。兩段看似互相矛盾的說法，很能突顯這點：「那些因緣際會讓我踏入了保釣運動和隨後而來的左派探索歲月，現在回想起來，都是空的。」；「目前台灣對『保釣』負面評價，但在七〇年代，不僅海外，台灣的知識分子普遍對中國之為祖國也有一種情懷。鄭鴻生後來寫的《青

省思有所突破，發展出曖昧迂迴、充滿詩意的敘事聲腔，成就了文學史上的郭松棻⁸⁶。

最後，與文學史上其他為人熟知的「保釣作家」——同屬柏克萊保釣世代的劉大任、李渝、張系國對照，郭是唯一未曾在生前發表內容直涉保釣的小說（《驚婚》為遺作，〈冰蠶〉並未出版），或以散文／雜文的形式追憶保釣，為之重新進行歷史定位者。

郭與保釣關係之隱晦、曲折，實構成保釣文學譜系中極為特殊的案例。倘若劉大任反覆表述保釣⁸⁷，張系國對《昨日之怒》「並非文學作品」的辯護⁸⁸，或李渝既否認保釣，又在離世前回歸相關整理工作的舉措⁸⁹，正面說明他們以書寫應對保釣遺緒，困足於「政治」與「文學」兩端的難局；郭之「避寫保釣」，實則反面——而更為精微地——體現這一點。

本文透過對郭松棻後期作品中保釣敘事的追蹤，嘗試梳理小說家與七〇年代歷史經驗協商的軌跡。期盼藉由本研究，打開以「保釣」為問題意識，介入郭後期寫作的進路；並指認其於保釣作家中，反向銘刻歷史經驗的特出之處，進而在此一基礎上，深化對於台灣保釣文學與左翼文學成果的認識。

春之歌》就寫了七〇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寫得很好。今天以台灣意識否認當時曾經存在的情境，連帶全盤否定『保釣』是不恰當的，不公正的。」簡義明，〈書寫郭松棻：一個沒有位置和定義的寫作者〉（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頁185；舞鶴訪談，李渝整理，〈不為何為誰而寫——在紐約訪談郭松棻〉，《印刻文學生活誌》1卷11期（2005年7月），頁49。

⁸⁶ 這來自審查人的洞見：「正是因為郭松棻不滿足於他重返文學之路，停留在〈冰蠶〉這樣直白的敘事、人物的扁平與思想的困境，他才決定將這樣的嘗試之作封塵，半途毀棄，進而不斷追索與寫作，我們才得以讀到後來的〈月印〉、〈雪盲〉、〈論寫作〉、〈今夜星光燦爛〉這樣的作品」。

⁸⁷ 劉的後期文學生涯堪稱保釣的「重複／重述史」，他對保釣的重寫可概分為三種模式：不同小說中類似情節／元素的重複，小說與散文的對應，以及不同散文對同一事件的描寫。詳待另文討論。

⁸⁸ 張系國，《昨日之怒》（台北：洪範，2002年），頁300。

⁸⁹ 李渝與簡義明合編《郭松棻文集：保釣卷》、《郭松棻文集：哲學卷》，此間意義不單單是彙整遺稿作為紀念——郭留下的手稿規模極為龐大，多篇小說、隨筆、讀書筆記尚未得到整理，然而李渝從中「選擇」了保釣。再者，面對郭的保釣遺產，李渝不僅是編者，也以附錄的形式在《保釣卷》末放入自身的保釣書寫，包括劇評〈在海外推展話劇運動是時候了〉、〈《桂蓉媳婦》演出的話〉、小說〈雨後春花〉和散文〈射鵰回看〉。在這層意義上，李渝既替郭中介其保釣寫作，同時將保釣正式接引回自身的話語脈絡中。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三島由紀夫著，劉華亭譯，《太陽與鐵》（台北：星光，1986年）。
- 李渝、簡義明編，《郭松棻文集：保釣卷》（新北：印刻，2015年）。
- 李渝、簡義明編，《郭松棻文集：哲學卷》（新北：印刻，2015年）。
- 唐文標編，《1984 台灣小說選》（台北：前衛，1986年）。現存台大圖書館特藏資料區。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編，《從近現代到後冷戰：亞洲的政治記憶與歷史敘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里仁，2011年）。
- 張系國，《昨日之怒》（台北：洪範，2002年）。
- 曹聚仁，《魯迅評傳》（香港：新文化，年份不詳）。現存台大圖書館特藏資料區。
- 梅家玲、楊富閔、鍾秩維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18 李渝》（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9年）。
- 郭松棻著，陳萬益編，《郭松棻集》（台北：前衛，1993年）。
- 郭松棻，《奔跑的母親》（台北：麥田，2002年）。
- 郭松棻，《驚婚》（新北：印刻，2012年）。
- 鄭穎，《鬱的容顏——李渝小說研究》（台北：印刻，2008年）。
- Hsia, Tsi-An, *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 黃錦樹，〈詩，歷史病體與母性——論郭松棻〉，《中外文學》33卷1期（2004年6月），頁91-119。

劉建基，〈愛與「癱瘓／麻痺」：論郭松棻〈雪盲〉中的喬伊斯幽靈〉，《文化越界》
1卷4期（2010年9月），頁121-134。

劉淑貞，〈論寫作，以及它的匱缺：論郭松棻的小說〉，《中山人文學報》第44期
（2018年1月），頁33-54。

（二）學位論文

陳湧漢，〈介入與他者的獻／現身——論郭松棻小說及《哲學卷》中的倫理實踐〉
（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

湯舒雯，〈史的暴力，詩的壟斷——台灣白色恐怖的文學見證、癥候閱讀與文化
創傷〉（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

簡義明，〈書寫郭松棻：一個沒有位置和定義的寫作者〉（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
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

魏偉莉，〈異鄉與夢土——郭松棻思想與文學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三、雜誌文章

柯贊如（郭松棻），〈黑暗裡的腿子們！——支持支加哥行動委員會反國民黨特務
的嚴正立場〉，柏克萊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編，《戰報》第2期（1971年6
月），頁15。

美國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中國學生研習小組，〈魯迅的討論——從「阿Q正
傳」看留學生的精神世界〉，《七十年代》第18期（1971年7月），頁46-49。

郭松棻，〈中國近代史的再認識〉，《大風通訊》第7期（1970年5月），頁1-3。

舞鶴訪談，李渝整理，〈不為何為誰而寫——在紐約訪談郭松棻〉，《印刻文學生
活誌》1卷11期（2005年7月），頁38-54。

鐵曇（郭松棻），〈阿Q與革命〉，《盤古》第36期（1971年1月），頁32-33。

四、報紙文章

中央社舊金山六日專電，〈周彤華籲僑社警覺 謹防野心分子 破壞愛國運動〉，
《中央日報》，1971年4月8日，第2版。

郭松棻、李渝、林冷等，〈木心的散文——專題討論會〉，《中報》，「東西風」，1986
年6月23日，第31版。

陳建忠，〈流亡者的思想病歷——郭松棻的文學道路〉，《中國時報》，2005年7月
17日，B3版。

五、未出版檔案

「郭松棻手稿」(1992年6月8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4_10-
0002。

「郭松棻手稿」(1992年6月8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4_10-
0003。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88_01-0002。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4_02-0006。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4_05-0002。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4_11-0002。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4_12-0001。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4_13-0007。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5-01。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6_12-0005。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6_13-0003。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6_13-0005。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6_14-0004。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097_22-0014。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102_12-0014。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116_13-0003。

-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檔案典藏號: 151_07-0003。
-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檔案典藏號: 151_07-0004。
-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檔案典藏號: 170_01-0001。
-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檔案典藏號: 177_04-0005。
-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檔案典藏號: 177_04-0007。
-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檔案典藏號: 185_08-0001。
-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檔案典藏號: 185_14-0002。
-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檔案典藏號: 185_21-0003。
-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檔案典藏號: 186_03-0001。
-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檔案典藏號: 189_07-0010。
-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檔案典藏號: 189_07-0013。
-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檔案典藏號: 189_10-0012。
-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檔案典藏號: 189_14-0016。
-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檔案典藏號: 189_16-0007。
-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檔案典藏號: 189_17-0013。
-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檔案典藏號: 189_19-0009。
-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檔案典藏號: 189_24-0003。
- 「郭松棻手稿」(日期不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檔案典藏號: 189_31-0003。

